

和平崛起：現實還是幻象？

• 岳健勇

一 「和平崛起」： 不同的解讀

中國自2001年12月加入世貿組織(WTO)以來，經濟出現持續高速增長，對外貿易和對外投資的規模急劇擴大，這既增強了中國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力，也對國際關係產生了一定的衝擊。與此同時，中國的軍費支出也在持續增加，「中國崛起」因而成為舉世關注的熱點。

中國正在崛起嗎？這一點似乎已無太多疑問^①，那麼「中國崛起」意味着甚麼？美日等國家的主流觀點認為，中國必然會像一次大戰前的德意志第二帝國那樣，憑藉工業化的經濟實力，通過軍備擴張，向國際體系發起挑戰^②。中國國內的多數觀點則認為，中國是經濟全球化和現行國際體系的受益者，保持與美國的合作性夥伴關係、維護國際體系的穩定，對維持中國經濟增長至關重要。中國官方理論家竭力向美國說明，中國深受資源短缺、環境壓力以及國內社會衝突

的困擾，最關注的是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等內政問題；中國尊重美國為東亞秩序的保障者，無意於尋求霸權或支配世界事務；中國將進一步融入世界經濟體系，以貿易和投資等和平手段來獲取世界資源，並通過不斷擴大的國內市場為「國際社會帶來更多的機會而不是威脅」，以此實現「和平崛起」^③。

美國對此做出反應，指出，許多國家都希望中國走「和平崛起」之路，但沒有哪個國家會因此拿自己的未來做賭注；美國的市場對中國的發展利益攸關，警告中國不要把美國市場對中國的開放看作理所當然；中國為了能源利益與蘇丹、伊朗等國合作有損中國的道義形象，敦促中國成為國際體系中「負責任的利益相關方」(responsible stakeholder)，並開放國內政治^④。這表明，美國並沒有接受中國的說辭，把中國崛起看成是「和平」的。相反，美國「歡迎」中國和平崛起所內含的條件與中國內外政策的底線存在難以彌合的距離，因而「中國崛起」

美日等國的主流觀點認為，中國必然會像一戰前的德國那樣，憑藉工業化的經濟實力挑戰國際體系。中國官方理論家竭力向美國說明，中國無意於尋求霸權或支配世界事務，而將實現「和平崛起」。美國則警告中國不要把美國市場對中國的開放看作理所當然，敦促中國成為國際體系中「負責任的利益相關方」。這表明美國並沒有接受中國的說辭。

在美國看來其實就是「中國威脅」。美國對「中國崛起」的擔心還受到國內佔主導地位的新現實主義國際政治理論的強烈影響，該理論認為，國家間為謀求權力最大化而發生衝突是不可避免的，新興國家為取得與自身經濟實力相稱的國際地位，必然要向「霸權國」發起挑戰。因此，中國崛起不論是否通過和平方式來實現，都將被美國視為威脅^⑤。

但是就目前階段而言，把中國與一戰前的德國相提並論是完全不符合歷史事實。首先，兩者的經濟地位不同，德國在一戰前已經完成工業化，經濟實力已超過英國而僅次於美國，具有很強的資本和技術輸出能力，在中歐、中近東和拉美國家中有很大的政治經濟影響。中國雖然在經濟規模上已居於世界前列，但離工業化的目標尚遠，在工業技術和國家現代化總體水平上與發達國家仍存在相當大的差距^⑥。其次，國際環境不同，一戰前的德國處在一個以歐洲為中心的多極世界，作為單獨一極的德國具有打破歐洲均勢、征服整個歐洲的願望和能力；而中國正處在一個由美國佔據全面優勢地位的一極體系內，中國既無願望，也完全不具備與美國全面抗衡的經濟、政治和軍事實力。

這一顯而易見的差別不可能不為西方國家的戰略家所洞察，但是，強調「中國威脅」在任何意義上都有利於美國對中國採取戰略遏制態勢，甚至先發制人的行動，從而迫使中國除了在國際體系內接受美國的領導地位外，別無其他選擇。換言之，中國謀求和平崛起的空間是有限度的，將受到美國主導下的單極國際體系愈來愈強有力的約束，這就是美國一再強調要在經濟和政治上把中國徹底納入

國際體系的原因所在^⑦。令人不解的是，中國也反覆強調融入國際經濟政治體系的極端重要性，將之看作是實現「和平崛起」的根本途徑。為甚麼會產生如此奇怪的國際政治現象？答案顯然只能從「中國崛起」本身去找。

二 「中國崛起」的基礎： 經濟增長

「中國崛起」之說最早見於二十世紀90年代中後期。當時，中國經濟增長速度較快，經濟總量的世界排名不斷躍前。有西方學者曾對此提出質疑，認為中國的經濟實力僅僅與中等國家的巴西相當，在國際政治中無足輕重^⑧。中國於2001年加入WTO之後，情況發生了質的變化。首先，中國與世界經濟融合的步伐大大加快，在全球經濟普遍不景氣的情況下，中國經濟發展速度遙遙領先。迄今，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已升至世界第四位(中國2005年完成經濟普查後新調整的數字)，國際貿易額則躍居第三位，外匯儲備僅次於日本。

其次，由於國內資源缺口不斷擴大，中國從海外大量進口能源和原材料，進口量的急劇增加對世界資源供求結構、乃至全球經濟產生了一定的衝擊，中國與美日等發達國家在戰略性資源上的利益衝突日益表面化。為確保能源供應，最近幾年中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規模，在中亞、拉美以及非洲等富產資源的國家進行投資，政治影響亦隨之上升。第三，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和高度開放產生的「溢出」效應，密切了中國與東盟的經貿關係，東盟對中國的敵意大大降低，中國在東盟的影響相應擴大，中國

把中國與一戰前的德國相提並論完全不符合歷史事實，這不可能不為西方戰略家所洞察。但強調「中國威脅」在任何意義上都有利於美國對中國採取戰略遏制態勢。中國受到美國主導下的單極國際體系愈來愈強有力的約束，這就是美國一再強調要把中國納入國際體系的原因。令人不解的是，中國也反覆強調融入國際經濟政治體系的極端重要性。

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主要不是來自國內消費，而是依靠投資擴張和出口貿易。在經濟快速增長的表像下，中國的正規製造業在非正規製造業和外資的競爭壓力下，發展規模卻相對萎縮，中國經濟從90年代末開始已出現「去工業化」跡象。在製造業核心的裝備製造上，國內集成電路的95%、高檔數控機牀的70%強、光電子製造設備的全部，轎車製造裝備及紡織機械的70%均依賴進口。

「睦鄰、安鄰、富鄰」的多邊化新亞洲政策在東南亞取得了顯著成效。這些動向表明，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已經對世界經濟和政治產生了不容忽視的影響力，這是「中國崛起」為國際社會所共同認知的根本原因。

問題是，中國的經濟增長是不是具有可持續性？中國以貿易和投資方式獲取世界資源能否確保無虞？鑑於中國能源需求的剛性特徵^⑧，如果中國與發達國家在獲取世界資源上的矛盾無法調和，「和平崛起」的進程必將中斷，屆時受到國際體系重重束縛的中國將何以應對？為甚麼給中國經濟增長「帶來極大好處」的國際體系最終反而可能摧毀中國經濟或其自身？所有這些問題的核心在於，中國經濟增長的內涵究竟是甚麼？！

三 經濟增長的實質

與大多數國家不同的是，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主要不是來自國內消費。從90年代以來，由於貧富差距持續擴大，導致社會整體購買力下降，消費需求的增長十分緩慢，消費在國民經濟中所佔的比重只有50%上下^⑨，

因而主要依靠投資擴張和出口貿易來推動經濟增長。中國正處在工業化過程中，製造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舉足輕重，製造業既是工業化的載體，又是承擔社會就業的主要部門，經濟增長的動力主要來自製造業^⑩。然而，在經濟快速增長的表像下，中國本國的正規製造業在非正規製造業和外資的競爭壓力下，發展規模卻相對萎縮，從90年代末開始，中國經濟已經出現了「去工業化」（工業化停滯不前）的某些跡象^⑪。

以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為基本特徵的經濟全球化^⑫，恰恰能夠為中國經濟增長提供新的動力來源。從2001年以來，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紛紛把製造業遷移到中國，這顯然有助於促進中國經濟的增長^⑬。但是跨國公司投資中國的主要動機並不是佔領國內的消費市場^⑭，而是在90年代末已基本完成對中國市場控制的基礎上^⑮，把中國作為超低成本的生产中心，向其控制下的全球市場大規模出口。這一策略十分成功，中國進出口貿易的近60%，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的近90%被外資控制（表1）；跨國公司通過中國市場實現了最佳方式的全球化運作，對中國產業形成了極大的競爭優勢。

表1 2005年1-9月中國高新技術產品進出口按企業性質分類統計

（金額單位：億美元）

2005年1-9月	出口	佔比 (%)	進口	佔比 (%)	貿易平衡
外資企業	1,317.0	87.8	1,109.9	79.5	207.1
國有企業	111.4	7.4	204.8	14.7	-93.4
集體企業	28.9	1.9	22.5	1.6	6.4
私營企業	43.1	2.9	58.4	4.2	-15.3
其他企業	0.036	0.002	0.746	0.053	-0.71
本國企業 (小計)	183.4	12.2	286.5	20.5	-103.1
進出口總計	1,500.4	100.0	1,396.4	100.0	104.0

資料來源：中國商務部網站

在外資企業巨大的競爭壓力下，中國製造業實力不斷下降^①，尤其是在製造業核心的裝備製造上，國內集成電路的95%、高檔數控機牀的70%強、光電子製造設備的全部，轎車製造裝備及紡織機械的70%依賴進口^②。中國製造業的衰敗直接導致了對本國高層次技術人才需求的萎縮，從而使社會整體的就業形勢趨於嚴峻^③。由於經濟增長目標被高度政治化，國內社會危機的加重反而加劇了政策目標的紊亂和政府行為的短期化，造成國內資源配置的進一步扭曲（如房地產業的過度開發），使經濟增長更加偏離工業化目標，並使宏觀經濟處於不穩定狀態^④。

中國經濟增長與工業化的背離，以及經濟政策對工業化目標的偏離，均透視出一個基本事實：經濟全球化對中國的工業化已構成嚴重壓制；受到世貿規則嚴格約束的中國政府，幾乎無法像冷戰時期的日本和韓國那樣對本國製造業實施產業振興方針。日韓兩國的工業化得益於冷戰時期兩極格局的國際體系提供的歷史機遇，美國出於遏制蘇聯的戰略考慮，不但對這兩個資本主義的東亞盟國單方面開放市場，並提供大量資本和技術援助，還允許它們採取各種限制進口和外資等產業保護措施。中國雖然在冷戰後期與美國結成戰略同盟，但因為中國是具有廣泛影響的社會主義大國，不在美國控制的資本主義全球體系內，因而仍然受到美國等西方國家在經濟技術上的嚴厲防範^⑤。

冷戰結束後，美國主導的單極國際體系建立，經濟全球化遂成為必然^⑥。經濟全球化是美國在嚴密控制國際體系的基礎上，對自由貿易和投

資大力推動並加以規則化的產物。美國積極推動經濟全球化，是因為規則化的全球經濟具有無法逆轉的強大擴張慣性，最有利於壟斷了規則制定權的美國發揮其經濟技術優勢。因此，美國在處理對華經濟關係時，一方面繼續保持對中國的高技術出口管制，另一方面又以其巨大的市場為誘餌，通過一輪又一輪的市場准入談判，迫使中國開放國內市場。這一政策對中國的發展戰略產生了強烈的誘導：中國要想實現經濟增長目標，就必須按照比較優勢原則加入經濟全球化。

在世界經濟史上，後起的工業化國家無一遵循「比較優勢」原則，無一不是依靠強有力的政府干預（美國和德國），或同時依託有利的國際環境實現技術趕超的（日本和韓國）。美國對此心知肚明，但利用中國市場化改革必然產生的對國際市場的強烈需求，以全球化這樣的「和平」方式誘使中國進入並依附於國際政治經濟體系，顯然比將蘇聯隔離在資本主義全球體系之外的辦法要高明和有效得多，這正是70年代末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美國歷屆政府對中國採取的一貫方針^⑦。

因此，中國要在全面加入經濟全球化並依託現存國際體系的條件下實現工業化，其難度之大是超乎想像的。目前，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國內市場的開放程度遙遙領先，甚至高於多數發達的資本主義大國，但中國的綜合競爭力、尤其是最關鍵的技術創新力卻幾乎排在世界主要大國的最末位（表2）。事實上，中國入世協定所確立的「全球公平競爭」框架已經把中國製造業全面擠壓到了生產的低端，在進口和外資的雙重夾逼下，

在世界經濟史上，後起的工業化國家無一遵循「比較優勢」原則，無一不是依靠強有力的政府干預，或同時依託有利的國際環境實現技術趕超的。美國對此心知肚明，但利用中國市場化改革必然產生的對國際市場的強烈需求，誘使中國進入並依附於國際政治經濟體系，顯然比將蘇聯隔離在資本主義全球體系之外的辦法要高明和有效得多。

表2 2005年綜合競爭力排名(世界前二十大經濟體)——表中列出的是主要的大國

國別	綜合排名	宏觀經濟 穩定性	企業 競爭力	技術創新	企業投資	人力資本	市場 開放度
美國	1	1	2	2	5	2	22
德國	5	4	15	6	16	7	15
英國	6	5	4	12	12	10	12
日本	8	22	21	21	5	11	24
法國	12	3	22	9	22	20	19
韓國	13	15	11	15	17	5	5
印度	22	23	24	21	19	27	23
中國	24	24	12	25	21	25	9
俄羅斯	25	25	24	24	14	—	—

資料來源：德勤(英國)2005研究報告

* 市場開放度高於中國的前八個國家是：愛爾蘭、比利時、荷蘭、奧地利、韓國、瑞典、芬蘭、加拿大。

中國大部分製造業只能從事低技術生產^④，因而，在這種表面上「雙贏」合作的全球化國際分工中，中國製造業的價值所得極其微薄^⑤，根本無力大規模增加研究與開發(R&D)投入，以提高技術創新能力。這勢必將導致中國與工業化國家(和地區)技術差距進一步擴大(表3)，使中國經濟無法擺脫對外國資本和技術愈來愈嚴重的依賴。這一趨勢如果不能及時扭轉，中國實現技術趕超和工業化的希望將成為泡影。

由此可見，對於發展中國家的中國來說，沒有工業化同步進展的經濟增長不可能導向真正的現代化。當前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實質上是一種利潤水平極低、缺乏產業技術進步支撐的「貧困式增長」，而恰恰是這種最容易被感知的經濟規模的片面擴大構成了「中國崛起」的基本內涵。顯然，這種建立在可替代的低技術產品大規模生產基礎上的「崛起」，很難轉化為中國左右國際經濟關係的強有力槓桿，真正加強中國在國際體系中的談判能力和權力地位^⑥。

當前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實質上是一種利潤水平極低、缺乏產業技術進步支撐的「貧困式增長」，而恰恰是這種最容易被感知的經濟規模的片面擴大構成了「中國崛起」的基本內涵。顯然，這種建立在可替代的低技術產品大規模生產基礎上的「崛起」，很難轉化為中國左右國際經濟關係的強有力槓桿。

表3 R&D世界前八位排名(以R&D全球1000指數的企業數衡量)

排名	國別/地區	佔全球R&D的 比重(%)
1	美國	42.0
2	日本	21.0
3	德國	6.3
4	英國	5.4
5	法國	4.5
6	瑞士	2.8
7	瑞典	2.2
8	台灣	2.2
*	其他	13.6

資料來源：英國貿易與工業部最新數據，轉引自英國《經濟學家》(The Economist)，2005年10月27日。

四 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 「和平崛起」的困局

事實上，即便僅僅把經濟增長定義為「中國崛起」的基本內涵，經濟全球化給中國造成的經濟增長與「去工業化」的雙重效應也並不可能長期並存，因為中國工業化的躑躅不前正在使經濟增長的內外環境趨於惡化，最

終將令經濟增長難以持續。這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由於中國製造業技術層次低下，產業進入障礙小，較高的國民儲蓄在片面追求經濟增長的體制環境中，容易演化為對低技術製造業的過度投資，以至於形成嚴重的產能過剩，使中國宏觀經濟在長期趨勢上呈現通貨緊縮的態勢。在此情況下，要阻止經濟衰退，緩和「去工業化」帶來的就業危機，只有靠低價向國際市場、特別是發達國家的市場大量出口。到2004年底，中國進出口額佔GDP的比重（貿易依存度）已達到70%，其中出口依存度高達36%，如此高的貿易依存度在世界大國中是絕無僅有的。有關數據表明，中國經濟增長比過去幾年任何時候都更加依賴於外部需求^②。這一脆弱的經濟結構對中國經濟和社會的穩定造成了巨大的外部風險。

其二，低技術製造業的生產過程普遍能耗高、資源消耗大、對環境的污染嚴重，它的競爭優勢在於資源和勞動力的廉價，這是中國比較優勢的基礎，也是吸引大量外資來中國投資的主要原因^③。但中國的資源稟賦是廉價卻不豐富，因而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必然是建立在對國內資源的透支式消耗和「血汗工廠」的基礎上。事實證明，這種以本國資源的過早枯竭、生態環境的全面惡化，以及嚴重的社會不公為代價而取得的經濟增長已經難以為繼^④。解決上述問題的根本出路在於中國製造業的現代化（即工業化），但是工業化與全球化無法相容，而且在全球化產生的政治社會心理已成定勢的情況下，中國經濟發展模式很難根本改觀，那麼維持經濟增長只有依靠大量進口能源和原材料。由於中國已經形成相當龐大的經濟規模，能源進口的過快增長不但提高了中國

的經濟成本，使中國貿易條件明顯惡化^⑤，更重要的是給中國的經濟安全帶來了愈來愈嚴峻的挑戰^⑥。

這樣，中國的經濟增長在關鍵的兩端高度依賴國際市場：在下游，大量低檔廉價商品須要依靠發達國家的市場來消化；而在上游，中國所需要的資源大多又分布在美國控制下的地區，因而，經濟增長不得不倚賴美國主導下的國際體系的穩定。為此，中國悄然放棄了其長期所倡導的「反霸」的外交宗旨^⑦，力圖通過與美國霸權秩序（hegemonic order）的「和平共處」，以維護對中國經濟增長至關重要的自由貿易機制（free trade regime）。儘管如此，中國對美國霸權秩序事實上的默認，卻依然無法避免中美因經濟全球化而產生的國家利益的衝突。

首先，經濟全球化抑制了中國工業化的發展，加劇了中國國內需求的不足，中國產品必然大量進入發達國家市場，從而引起發達國家部分產業的萎縮及國際收支的惡化。如果說這個過程是不可避免的，那麼，發達國家從國內政治及本國利益出發，對中國的出口加以限制同樣是不可避免的。問題的實質不在於自由貿易與保護貿易之爭，而在於中國是個經濟規模十分龐大的大國，把經濟增長的希望寄託在發達國家的內需上本身就是不現實的，也是危險的；而且，不具備真正的經濟技術實力、因而不具備必要的「議價」能力的中國，也根本無法阻止掌握着規則制定權和解釋權的發達國家以「公平貿易」（fair trade）的名義來限制中國的「自由貿易」（free trade）。

其次，經濟全球化造成了中國對世界資源巨大的剛性需求，鑑於這些戰略性資源（以石油為例）的不可再生性，大國在世界資源上的爭奪必然是

到2004年底，中國進出口額佔GDP的比重已達到70%，其中出口依存度高達36%，如此高的貿易依存度在世界大國中是絕無僅有的。經濟規模龐大的中國把經濟增長的希望寄託在發達國家的內需上是很危險的；而且，不具備真正的經濟技術實力、因而不具備必要的「議價」能力的中國，也無法阻止掌握着規則制定權和解釋權的發達國家以「公平貿易」的名義來限制中國的「自由貿易」。

「零和博弈」(這一點與世界是否應該感謝中國提供了廉價消費品無關)；而且，像石油這樣的戰略性資源與地緣政治還存在着共生關係^③，因而中國進口的過快增長引起的世界資源消費格局的質變，使中國與美日等大國發生衝突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④。

五 中國崛起的根本出路

由此可以看出，中國經濟增長受到了它自身無法控制的外部因素的嚴重制約，中國期望通過與國際體系的合作來實現長期和平發展(「和平崛起」)的想法顯然是不現實的。當然，在市場依賴和資源依賴之間，更大的挑戰來自後者，因為在前者問題上產生的衝突在可預見的將來，仍然可以通過如增加進口等和平妥協的方式來解決。但是，中國在資源問題上則無法退讓，除非中國甘願放棄經濟增長目標，否則，中國最初以和平方式獲取資源的努力，在不斷遭遇來自發達國家的抵制和破壞後^⑤，為維持經濟增長及其背後的社會政治目標，很可能最終不得不以非和平的方式來解決與發達國家在資源利益上的衝突^⑥。那樣的話，中國將不得不與美國的霸權做殊死的搏鬥，這就決不是中國崛起之戰，而僅僅是為中國的生存而戰。

因此，無論是經濟全球化還是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都不可能是中國實現崛起、特別是和平崛起的必然之路。中國崛起的根本出路在於本國製造業的全面自主振興，為此必須以科學求實的態度深入探索實現這一目標的根本途徑。只有實現了工業化和國家政治的現代化，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國內的社會政治危機，從而使中國的崛起真正成為無法阻擋的大趨勢。

無論是經濟全球化還是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都不可能是中國實現和平崛起的必然之路。中國期望通過與國際體系的合作來實現長期和平發展的想法顯然是不現實的。中國崛起的根本出路在於本國製造業的全面自主振興，只有實現了工業化和國家政治的現代化，才能根本解決國內的社會政治危機，從而使中國的崛起真正成為無法阻擋的大趨勢。

註釋

① Robert Sutter, "Why does China Matter?",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Winter 2003-2004).

② 見美國政治學家米爾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等人的論述。

③ Zheng Bijian, "China's 'Peaceful Rise' to Great-Power Status", *Foreign Affairs* 84, issue 5 (September/October 2005); Wang Jisi, "China's Search for Stability with America", *Foreign Affairs* 84, issue 5 (September/October 2005).

④ "Wither China: 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 Robert Zoellick, Deputy Secretary of State Remarks to 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 21 September 2005.

⑤ 西方有一種理論(「民主和平」)認為，民主國家之間不會發生戰爭。根據該理論，中國只有在政治制度上民主了，中國的崛起才可能是和平的，才不會對世界秩序構成威脅。西方政治家和學者大多以此為由，對中國崛起表示不信任。事實上，民主國家之間同樣存在國家利益之爭(如美日在經濟利益上的尖銳衝突)，即使中國實現了政治民主化，中美在東亞地緣政治利益上的對立也不會自動消失。美國的新現實主義理論恰恰並不區分國家政治制度上的差異，而是認為，中國的崛起必然引起國際體系中權力的消長，在國際社會依然處於無政府狀態的情況下，作為霸權國家的美國與新興國家的中國之間的衝突將在所難免。

⑥ 中國科學院於2005年2月18日發布了《中國現代化報告2005》。承擔此項研究的中科院中國現代化研究中心中國現代化戰略研究課題組，在進行大量數據分析和科學比較後指出，2002年中國綜合經濟現代化指數在世界108個國家中排在第69位。2002年中國仍然屬於經濟欠發達國家，距離世界經濟先進水平的差距非常大。2002年，中國處於工業化的中期，經濟現代化水平低於世界平均水平。報告認為，如果把人均GDP和經濟結構的綜合年代差理解為中國經濟現代化水平與其

他國家的年代差距，那麼，2002年，中國經濟現代化水平只相當於1858年的英國、1892年的美國、1957年的日本和1976年的韓國經濟現代化水平。見〈中國離發達國家有多遠？核心競爭力成為制約瓶頸〉，2005年10月13日，中新網(www.chinanews.com.cn/news/2005/2005-10-13/8/637232.shtml)。

⑦ 美國副國務卿佐利克 (Robert Zoellick) 在2005年9月21日對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發表的演說中談到，「來自美國兩黨共七任總統都認識到(中國加入全球化)這一戰略轉變，並致力於把中國完全納入到國際體系中」。佐利克在談到中國應成為國際體系中「負責任的利益相關方」時特地做出解釋，那就是「中國有責任加強給它帶來成功的國際體系，這樣才能實現……『超越大國崛起的傳統方式』的目標」。

⑧ Gerald Segal, "Does China Matter?",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1999).

⑨ 韓曉平：〈石油，中國現代化的剛性需求〉，中國能源網(www.china5e.com)。

⑩ 消費在中國國民經濟中所佔的比重呈不斷下滑之勢，相比之下，大多數國家消費在國民經濟中所佔的比重一般在65%左右，發達國家的消費佔比甚至高達80%。

⑪ 據相關資料，中國製造業增加值大約佔GDP的40%，工業製成品出口在全部出口中的比重達到90%以上，製造業提供了國家財政收入的50%左右，並吸收了近一半的城市就業人口。

⑫ 程曉農：〈重新認識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與結果〉，《當代中國研究》，2003年第1期。

⑬ 所謂貿易和投資自由化，是指大幅度削減貿易壁壘，並取消大部分的投資限制，以便在本國市場建立「全球公平競爭」(global level playing field)的機制，使國內市場的競爭完全國際化。

⑭ 以2003年為例，國內製造業投資額為3,639億元，外資企業製造業投資為369億美元(相當於3,050億元人民幣)，佔其全部在華投資的近70%。

⑮ 從90年代後半期以來，外資在投資過程中已經發現，中國市場的實際規模遠不如想像的那麼大。

⑯ 岳健勇：〈不容樂觀的工業化前景〉，《讀書》，2004年第7期。

⑰ 〈外資強勢進攻，我國製造業如何突出重圍〉，2005年4月5日，中國自動化網(www.ca800.com/05/4-5/n21679.asp)。

⑱ 王思睿：〈專家預警中國製造國際差距〉，《第一財經日報》，2005年11月23日。徐匡迪：〈中國製造業的現狀與面臨的挑戰〉，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國發展觀察網，2005年4月26日(www.chinado.cn/ReadNews.asp?NewsID=299)。

⑲ 外資在中國的製造業投資以勞動密集型的加工裝配為主，對國內工程技術人員的需求十分有限；而中國本國製造業因與外資企業的實力差距較大，無法為科技人員提供有吸引力的工資待遇及良好的工作環境，因而高校理工科類畢業生紛紛改行，轉向待遇較好的商業和金融等服務業領域，而中國製造業的萎縮對國內技術人才需求的減少，則進一步促使理工科畢業生大量湧向第三產業。這不但不利於中國製造業的技術積累及創新能力的提高，而且，由於現代化的服務業是建立在工業化基礎上的，在工業化進展緩慢的情況下，服務業的發展空間相當有限，很難創造出更多的就業機會。因此，中國製造業的衰敗使社會整體就業形勢趨於惡化。

⑳ 例如，城市化在短時期內會帶來GDP的增長，但這種大多沒有多少工業化根基的城市化，除了增加由農民轉化而來的新的城市貧民人口外，還刺激了其他領域的投資泡沫(如房地產的過度投機)，最終導致財富分配更加失衡，並使宏觀經濟面臨更大的風險。

㉑ 如美國始終不給予中國產品普遍優惠制(GSP)待遇，對中國出口產品只給予有條件的最惠國(MFN)待遇，美國控制下的「巴黎統籌委員會」對向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的高技術出口實行嚴格管制等等。

㉒ 岳健勇：〈全球化與美國對華戰略〉，《鳳凰周刊》，2005年第15期。

㉓ 同註④。佐利克認為，不能把中國與40年代末的蘇聯簡單類比，因為中國現在已深信，它的成功有賴於與「現代世界」的聯繫，中國的未來決不在於顛覆國際體系的基本秩序。

㉔ 甚至不少國內的所謂高技術產業，其實也僅僅是披上了高技術的外衣，核心部件依賴進口的加工裝配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據筆者不久前在廣東的調研訪談。

㉕ 據國家發改委產業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副所長胡春力透露，中國整個製造業的利潤率為5-6%，高技術產業的利潤率只有2-3%。同註⑦。

㉖ 在2005年中國與歐盟和美國關於紡織品出口配額的談判中，都是以中國的最終妥協而告終，這就清楚地表明中國仍然缺乏足夠的與發達國家討價還價的能力。

㉗ 郭瓊、胡蛟：〈會診中國經濟〉，《財經》，總143期(2005年10月3日)。

㉘ 跨國公司轉移到中國的製造業(包括所謂的高技術製造業)，實際上是將其價值鏈中低附加值、適合於勞動密集型簡單裝配的部分轉移到了中國。

㉙ 陳國軍：〈被透支的中國發展〉，《中國報導周刊》，2004年1月15日。

㉚ 中國資源進口數量的逐年激增導致中國經濟成本大幅度上升，與此同時，由於國內企業相互惡性競爭，出口產品的價格不斷走低。

㉛ 據中國能源專家的估計，到2020年中國石油消費量將增至五億噸，有三億噸須要進口，對外依存度將高達60%，超過美國目前50%的水平，而50%是公認的能源對外依存的警戒線。見〈能源專家：2020年我國石油對外依存度將超過美國〉，新華社烏魯木齊2005年10月12日電(<http://finance.people.com.cn/GB/1038/3763890.html>)。

㉜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外交政策的一貫立場是「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2002年中共十六大政治報告將提法修改為「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不再提反霸。見〈江澤民在黨的十六大上所作的報告(9)〉(2002年11月17日，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2-11/17/content_632296.htm])。

㉝ Robert E. Ebel, "The Geopolitics of Energy into the 21st Century", vol. 1, p. 7. 轉引自Michael Klare, *Blood and Oil: The Dangers and Consequences of America's Growing Petroleum Dependency* (London: Penguin, 2005).

㉞ 例如，中國最近幾年從加拿大大量進口瀝青沙，引起了美國的高度警覺，因為瀝青沙歷來被美國視為對其能源安全意義重大；另外日本防衛廳在2004年底修改了安全戰略，部分是基於這樣的假設，即日本與中國在資源上的衝突有可能升級為戰爭。David Zweig and Bi Jianhai, "China's Global Hunt for Energy", *Foreign Affairs* 84, issue 5 (September/October 2005).

㉟ 例如，以貿易和投資這樣的和平手段，即使是在美國控制之外的地區也並不一定能確保中國獲取資源，或確保資源的長期供給，這主要是因為中國的工業化水平低，資本和技術輸出能力遠遠不夠，無法對經濟落後但資源豐富的發展中國家真正產生深遠的政治經濟影響，因而這些國家大多抱著「賣給誰都一樣」的臨時心態。中國如果遇到來自發達國家的強有力競爭，將很難與之抗衡。此外，中國對海上運輸線安全保障能力的嚴重不足，以及某些能源大國(如俄羅斯)在地緣政治上的複雜考慮(中日在俄羅斯石油管道上的較量已經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也不利於中國獲得長期穩定的能源供給。

㊱ 隨着中國和日本對世界能源競爭的加劇，兩國在東海石油資源上的爭奪幾乎到了劍拔弩張的地步。

岳健勇 1989年畢業於北京外國語學院，主修英語及國際關係。1999年從上海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取得工商管理碩士學位。曾任職中國國有企業、在華跨國公司及新聞界。現於倫敦經濟政治學院攻讀政治學博士。